

曲阜孔氏“弘治谱”考辨*

孔维亮 于 芳

提 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曲阜孔氏曾于明弘治二年编修家谱的说法，此说几成定论。然而，该谱至今未见流传于世。涉及人物主要有孔弘幹、孔弘绪、孔弘泰等。翻检史料，孔弘幹的生活年代晚于弘治时期，亦未见孔弘绪、孔弘泰编修家谱的蛛丝马迹。而且明清曲阜孔氏家谱均不见该谱序文，与修谱惯例明显不符；历代志书、家谱等也未提及该谱。追本溯源，此说当起于民国26年《孔子世家谱》孔传堉序文“弘治二年”为“天启二年”之误，此后则以讹传讹，流传甚广。

关键词：曲阜孔氏“弘治谱” 孔弘幹 孔弘绪 孔弘泰 孔传堉

家谱是记录家族成员世系衍变及生平事迹的私家文献，具有详世系、序昭穆、联疏亲、厚伦宜、严冒紊重要作用。孔氏家族以孔子为始祖，逐渐形成以曲阜60宗户为中心，囊括众多外地流寓支派的庞大家族，世人以“天下第一家”称之，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样本。曲阜孔氏自北宋元丰八年（1085）开始正式编修家谱，其后代不乏人。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孔氏家谱定名为《孔子世家谱》^①，此后历经乾隆十年（1745）、民国26年（1937）、2009年等多次大修，规模不断扩大。《孔子世家谱》以其延时之长，族系之明，纂辑之广，核查之实，体例之备，保存之全，堪称存世谱牒之冠，极具研究价值。^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孔氏家谱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③ 但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学者们经常提及明弘治二年（1489）的修谱活动，而对其具体情况语焉不详；一些学者虽未提及该谱，却又不否定它的存在，迄今未见专文探讨。关于弘治二年修谱的

* 本文为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儒家文化视域下孔孟家谱比较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4JSGX027）阶段性成果。

① 康熙二十三年《孔子世家谱·修谱凡例》第一条即称：“家谱标题旧曰《孔氏族谱》，与编氓家乘何异？昔太史公叙孔氏世次，特称曰《孔子世家》，素王之尊，等于侯国。此家谱所托始也，今即以为名。”孔毓圻鉴定，孔尚任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修谱凡例》，“国立中央图书馆”，1969年影印本，第77页。

② 参见孔德墉主编：《孔子世家谱》卷首《〈孔子世家谱〉本次续修告全体族人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③ 代表性成果有郭松义：《孔姓宗谱和孔氏家族组织——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张海瀛主编：《谱牒学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95—208页；陈东霞：《天下第一家谱——〈孔子世家谱〉》，《山东图书馆季刊》1994年第2期；周祚绍：《修谱：收族的法门——清代孔氏修谱档案论析》，《民俗研究》1994年第3期；孔勇：《“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齐鲁学刊》2020年第1期；史连祥：《在教化中形塑生命共同体——民国〈孔子世家谱〉撰修仪式的文化阐释》，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吴佩林、邓利平：《内生还是外力？——民国合修〈孔子世家谱〉原因分析》，《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王鹤鸣：《“天下第一谱”：〈孔子世家谱〉》，《寻根》2022年第2期。

主持者，有孔弘幹、孔弘绪、孔弘泰等多种说法。^①“弘治谱”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明清以来衍圣公主导修谱活动起始时间的界定，对孔氏家族历史书写乃至当今修谱活动都有重要影响。笔者在查阅地方志、家谱、碑刻等相关文献后认为，弘治年间曲阜孔氏特别是衍圣公没有编修家谱，所谓曲阜孔氏“弘治谱”并不存在。本文拟对该问题进行专门考证，并考察曲阜孔氏“弘治谱”这一说法的来源及流传过程，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 曲阜孔氏“弘治谱”子虚乌有

涉及“弘治谱”的主要人物中，关于孔弘幹的破绽最为明显。现存孔林的孔弘幹《墓表》载：“正德乙亥……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乃生公”“万历丁丑八月二十五日公已宾天。”^②据此可知孔弘幹生活年代为正德十年（1515）至万历五年（1577）。所谓“弘治谱”出现在孔弘幹出生之前，自与弘幹无涉。孔弘幹是明代孔氏族人中的知名人物，著作颇多。康熙二十三年《孔子世家谱》记载：“弘幹字以象，号振斋，由鲁府审理、纪善进阶朝议大夫，尝续宗谱，并《孔门彙载》《孔氏文献》《谈柄》《词话》《淳庞风味诗集》。”^③《墓表》在提到其著述时也称：

慨孔门诸书散逸，遂折衷《祖庭广记》等书，删繁举要，题之曰《孔门彙载》，凡三十八卷，卷近百叶，皆亲手披录，附示后裔。鲁王重其德，荐为审理正，以世府师礼尊之。公复取王国史书以订孔氏谱系，按传采录，参以志碑，视昔颇征。^④

孔弘幹“尝续宗谱”的说法，后世志书未见记载。真正编修家谱的是其父孔承懿，但孔弘幹可能以其所取王国史书所订之孔氏谱系参与孔承懿编修的家谱中，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尝续宗谱”。

孔承懿编修家谱之事，清代乾隆年间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中追溯历代家谱时称：“六十代孙、明处士承懿皆相继续修。”^⑤该谱在康熙《阙里志》、乾隆《曲阜县志》中均作《孔氏新谱》。^⑥孔承懿，字永淑，号南坡，留意宗门，著有《南坡集》，年七十五而卒。据《墓表》，其生卒年分别为成化癸巳、嘉靖丁未^⑦，其生活年代为成化九年（1473）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弘治年间恰好处于这一时段。弘治二年孔承懿年仅17岁，很难相信如此年轻之人能够承担编修家谱的重任。实际上孔承懿编修家谱并不在弘治年间，而是在其晚年的嘉靖年间。孔承懿在《孔氏新谱》序文开头就说：“宗谱之编，自我皇明洪武甲子前翰林院检阅五十三代世清公

① 参见孔令朋：《孔裔谈孔》，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6—27页；孔祥林主编：《孔子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孟继新：《孔子家史》，远方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② 宋德隆撰，王承祚书：《鲁藩审理正致仕进阶奉议大夫孔公墓表》，明万历十三年（1585）立石。

③ 孔毓圻鉴定，孔尚任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9《第二十·文献户》，第861页。

④ 宋德隆撰，王承祚书：《鲁藩审理正致仕进阶奉议大夫孔公墓表》，明万历十三年立石。

⑤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31《孔氏著述第十一》，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677—678页。

⑥ 参见孔尚任编纂：康熙《阙里志》卷18《著述志》，“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孔子博物馆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影印本，第14册，第24页；潘相纂修：乾隆《曲阜县志》卷53《著述》，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386页。

⑦ 参见郭本撰并书：《孔南坡先生墓表》，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立石。

纂续详明，迄今百六十年。”^①洪武甲子年为十七年（1384），160年之后为嘉靖二十三年，由此推测《孔氏新谱》编修当在嘉靖二十三年左右，上距弘治二年已经55年。关于孔承懿的修谱动机，其《墓表》记载：“愤异姓冒孔避庸调，乃白大宗成庵公詮次家谱甚悉，使伪者不能乱。”^②其本人亦自叙：

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承懿为此惧，以其事白于族长、举事曰：“谱牒之修，所以考世系，叙尊卑，表先德，而合族者也。顾吾门为海内文献之家，而家乘久稽，缺而不修，可乎？”于是请于今六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大宗成庵先生，遂有续谱之命焉。^③

由此可知，孔承懿修谱主要是有感于异姓冒入和家谱久而不修，遂请命于衍圣公孔闻韶而作。同时关于孔闻韶的文献，很少见其修谱的记载。可以说，嘉靖《孔氏新谱》主要是孔承懿的自发行，与孔闻韶关涉不大，并非衍圣公主导。嘉靖二十三年（1544），孔承懿已年逾七旬，精力与体力难免有所不逮，而其子孔弘幹时年3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可以想见，孔弘幹很有可能协助其父完成此次家谱的编修。可惜该谱后来亡佚，今人无从得见。孔弘幹“尝续宗谱”当是嘉靖《孔氏新谱》，而非“弘治谱”。

弘治年间曲阜孔氏大宗嫡长为孔弘绪，而实任衍圣公之事的是其弟孔弘泰，二人为前衍圣公孔彦缙之孙、赠衍圣公孔承庆之子。孔弘绪，字以敬，号南池，景泰六年（1455）十月袭爵。孔弘绪幼年袭爵，身份高贵，生活养尊处优，远离京师，缺乏约束，久而久之沾染恶习；其岳父又为当时重臣李贤，孔弘绪有恃无恐，行事无所顾忌，终于在成化五年（1469）因事夺爵，废为庶人。其时，孔弘绪年22岁，尚无子嗣，经过廷臣合议，由其弟孔弘泰代为袭爵，以后爵位仍由孔弘绪之子承袭。孔弘泰，字以和，号东庄，他接受其兄教训，袭爵34年期间，严格约束自己，恪尽职守，修葺林庙，恤养族人，堪称表率。孔弘绪废爵之后改过自新，弘治十一年（1498），山东巡按御史上奏孔弘绪迁善修行，请复其爵，皇帝命其冠服家居。孔弘泰卒于弘治十六年，其后由孔弘绪之子孔闻韶袭封衍圣公，孔弘绪卒于弘治十七年。

综观弘治一朝18年，先后在任的衍圣公为孔弘泰、孔闻韶，孔弘泰于前16年在任，孔闻韶后2年在任，而被废为庶民的大宗嫡长孔弘绪亦几乎贯穿整个弘治朝。明代曲阜孔氏大宗嫡长衍圣公虽然爵高位尊，但并不参与具体的行政事务，其主要职责为奉祀孔子、守护林庙以及统摄宗族。面对前任衍圣公孔弘绪的罕见被废，孔弘泰勤勉任事，实际上他在宗族建设方面作为颇多，像编修家谱这样的宗门盛举，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必定大书一笔。而孔弘绪当时被废为庶民，尽管已经不再是衍圣公，但他大宗嫡长的身份仍然存在，编修家谱这样与官无涉的私家之事，孔弘绪作为实际的宗子也并非没有主持或参与的可能。二人去世不久，墓志铭即已写作完成，作者正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李、孔两家为姻亲，李东阳之女嫁与孔弘绪之子，李东阳与二人关系密切，彼此十分熟悉。即便李东阳不知他们兄弟二人编修家谱之事，孔家之人不可能不向其透露并由其写入墓志铭中。墓志铭的写作通常遵循隐恶扬善的原则，尤其是对曾犯下大罪废爵为民的

① 陈镐撰，孔弘幹续修：嘉靖《阙里志》卷15《附录·阙里孔氏新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3册，第884页。

② 郭本撰并书：《孔南坡先生墓表》，明嘉靖四十二年立石。

③ 陈镐撰，孔弘幹续修：嘉靖《阙里志》卷15《附录·阙里孔氏新谱序》，第884—885页。

孔弘绪更是无善不书，其墓志铭详述皇家恩荣以及“奏给三氏教授印，开生员岁贡格，蠲孔氏田租十之七”等大事，唯独不见关于编修家谱的片言只语，孔弘泰墓志铭同样如此，这不能不令人生疑。退一步讲，即便李东阳认为此事并不重要而不记述，但孔氏族人编修的《阙里志》《阙里文献考》等家族志书，甚至家谱小传中同样也付之阙如，而后来主持编修家谱的孔胤植、孔兴燮、孔毓圻、孔昭焕几位衍圣公均有明确的记载。^①这就显然不是疏于任事所能解释得通的了。因此可以断定，孔弘绪、孔弘泰二人并未编修过家谱。

孔继汾系统整理历代家乘，结合官方与地方等其他文献，所著《阙里文献考》，体例得当，内容丰富，考证严谨，堪称孔氏家族志书的集大成者。他在该书备述唐宋以来孔氏历代家谱编修情况：

至《孔子系叶传》始于唐黄恭之，然止叙承袭一人，殊多疏略。宋元丰中，四十六代孙、刑部侍郎宗翰病之，上自孔子，下止四十九代，作《孔子世家谱》。四十八代孙、宋国子博士端朝；四十九代孙、金曲阜主簿瑰；五十代孙、元济兖三州宣课提领薰；五十一代孙、元衍圣公元措，宋谏议大夫应得；五十三代孙、元参知政事淑，翰林院检阅泾，吴江州判涛；五十四代衍圣公及处士思敬；六十代孙、明处士承懿，皆相继续修。厥后时有增辑，然书只有抄录，未有刻本。明天启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始重修钺板。此后小修则书之，大修则刊之，皆以三十年为限。国朝顺治甲午六十六代衍圣公，康熙甲子六十七代衍圣公，皆举其事。顺治甲午重修谱二十三卷，康熙甲子重修谱二十四卷。乾隆甲子，今衍圣公复经增修，为书二十三卷。六十七代孙毓佶摘其大凡，为《家谱纂要》一卷。^②

遗憾的是，孔继汾对时代较远的宋、金、元等朝孔氏族人修谱活动了如指掌，甚至是身处阙里祖庭的他对衢州南宗族人孔端朝、孔思敬、孔应得、孔涛修谱之事并不讳提，然而对明代北宗曲阜所修之谱并未提到所谓“弘治谱”。这正与孔承懿在嘉靖《孔氏新谱》序文中的说法一致。孔承懿追记前代编修家谱之人：

谱牒相承，宋宗翰公载以余支，而其法始备。中更练塘洪氏博采史传，以增其未备者，信实可传矣。后之叙者代有其人，在阙里则有四十九代祥符簿瑰公，五十代开封令薰公，五十一代宗子梦得公，五十三代朝城尹淑公、检阅泾公，五十四代宗子文肃公；在衢则有四十八代朝散郎端朝公，五十一代谏议大夫应得公，五十三代吴江州判涛公，五十四代思敬公，沿革之由各见序文。^③

① 以民国26年《孔子世家谱》为例，“衍植”条下记云：“向家谱惟抄本，易为混淆，公始刊刻”，“兴燮”条下记云：“纂定《世家谱》二十三卷”，“毓圻”条下记云：“重修《世家谱》二十四卷，编正《孔子家谱》二卷”，“昭焕”条下记云：“恪承父志，增修《孔子世家谱》”；而“宏绪”“宏泰”条下，均无其编修家谱的记载。为避清世宗之讳，孔胤植常作孔衍植；为避清高宗之讳，孔弘绪、孔弘泰常作孔宏绪、孔宏泰。见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初集《卷三之一·大宗户》，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96、99、100、102、127页。

②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31《孔氏著述第十一》，第677—678页。

③ 陈镐撰，孔弘幹续修：嘉靖《阙里志》卷15《附录·阙里孔氏新谱序》，第884页。

嘉靖朝与弘治朝相隔并不久远,孔承懿的记载可信度高,如果真的存在“弘治谱”,孔承懿绝不可能漏记。对照两段记载,孔承懿、孔继汾所提到的修谱之人完全相同,这说明孔氏家族的历次修谱活动非常明确,为后世所公认。此外,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三年《孔子世家谱》卷首天启二年(1622)孔弘颢所撰《宗派总论》之后的小字附识中也说:“家谱之纂,创始于四十七代祖周翰公(引者注:孔宗翰,孔子四十六代孙,字周翰,此处四十七有误),垂四百余年。而余从曾祖念初公(引者注:孔弘颢,字以修,号念初,时任校阅,为主要从事者之一)又续其事,考核精确,编次详明,较前谱尤称美备。”^①由北宋元丰八年孔宗翰以下而直接承续天启二年《孔氏族谱》,这从侧面也证明了没有“弘治谱”。因此从文献著录的角度可以断定,弘治年间曲阜孔氏并无编修家谱活动,不存在所谓“弘治谱”。

修谱序文一般记录编修家谱的起因、经过,强调其意义,对研究家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体现家谱的传承有序和实现文献资料的保存,明清以来曲阜孔氏历次修谱于卷首除刊印当时参与其事的主要人物所作的序文外,还有收录旧谱序的惯例。然而除顺治十年(1653)所修家谱久已失传详情不得而知外,历代家谱所收旧序中从未见过“弘治谱”序文。而且这些序文在谈到修谱历史时,也从未提及弘治二年修谱之事。如天启二年孔弘颢在引述孔宗翰序文后说:“此我祖族谱之刊,所以有功宗门也。自时厥后,绍述纂修虽不乏人,而刊布之事寥寥无闻,宁非缺典乎!……颢无似,叨奉洙泗,滥掇家庭,目击其弊,有慨于中久矣,不揣庸陋,辄取而增修之,刊印成帙,散布诸宗,敢云媲美前人。”^②孔闻简称:“是谱创修于宋宗翰祖,残缺已久,余慨其亥豕,建议修葺。”^③孔胤淳则在顺治谱序中直言:“按谱之修,创自周翰祖,至先宗主乃重修之,我宗主则继修之,其皆有忧患之心乎!”^④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弘治谱”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二 曲阜孔氏“弘治谱”说法的来源与流传

综合以上各种证据,笔者认为所谓曲阜孔氏“弘治谱”实际上子虚乌有。那么,曲阜孔氏“弘治谱”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谁是这种说法的最初提出者?笔者翻阅各种文献后发现,该说法最早见于民国26年《孔子世家谱》中当时的孔氏族长孔传堉所作序文,孔传堉即为肇始之人。

据民国《孔子世家谱》载:“传堉,字美坡,三等首领官,代理四氏学,兼林庙奉卫官,监修尼山、洙泗、石像、中庸四书院庙工,又为圣庙后寝殿工程处顾问,现任家庭族长,主祀春秋书院。子六,继奎、继钊、继汾、继馆、继盈、继盟。”^⑤孔氏族长之设始于北宋,多以行辈尊崇、齿德兼优之族人担任,其人熟悉家门掌故,协助衍圣公处理族内事务,地位较高,颇具影响。历代家谱序文作者不止一人,多由衍圣公和曲阜孔氏世职知县等人充任。衍圣公于民国24年(1935)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世职知县也废除已久^⑥,孔氏族长成为取代世职知县影响的重要人物。民国《孔子世家谱》序文除特任大成至圣奉祀官孔德成署名

① 孔毓圻鉴定,孔尚任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宗派总论》,第131页。

② 孔毓圻鉴定,孔尚任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孔弘颢序》,第34—35页。

③ 孔毓圻鉴定,孔尚任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孔闻简序》,第40—41页。

④ 孔毓圻鉴定,孔尚任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孔胤淳序》,第47—48页。

⑤ 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初集《卷六十之一·息陬户》,第1951页。

⑥ 曲阜孔氏世职知县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废止,曲阜知县改由流官担任。

一篇外，另有一篇即为时任族长的孔传埭撰写。孔传埭序文有言：

考我家乘，宋以前只具册写，自四十六代宗翰祖始创为刊印。至明弘治二年首次重修，并定为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清顺治十年未及甲子又重修，迨后康熙、乾隆两甲子均重修勿替，可谓极重视谱牒矣。惟四次重修皆于六十户编纂加详，而流寓各支弗与焉。^①

该段叙述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首次言明孔氏家谱自北宋孔宗翰后，首次重修于弘治二年，并有大修小修时间之规定。然而仔细阅读，不难发现问题。弘治二年与顺治十年之间，尚有弘治十七年（1504）、嘉靖四十三年（1564）、天启四年（1624）3个甲子年，何故不言修谱之事？距顺治十年最近的、明确的孔氏修谱之事发生于天启年间，天启、顺治、康熙、乾隆4次重修确实无疑，而何故不提天启修谱？显而易见，据文意推知此处“弘治”二字实为“天启”之误。^②

明清时期孔氏历次修谱，主要于曲阜60宗户之内进行，“盖旧谱以博采难周，仅志鲁籍六十户，时为之也”，民国时期则“交通便利，而声气易达，爰举流寓外省者并录之”^③，条件成熟，因此兼收全国范围之内孔氏族人而编修阖族大谱。面对此次史无前例的修谱盛事，曲阜孔氏选拔族中俊彦及得力之人，成立由66人组成的庞大修谱机构，分掌总裁、提调、监修、编次、校阅、收掌、文牒、书记、收发、庶务、会计、交际、督刊等事宜，远超历次修谱之规模，可谓人数众多，分工明确。孔传埭担任提调一职，排名仅次于总裁孔德成，地位之高不言而喻。对于修谱之事，孔氏慎之又慎，要求“与斯事者尤宜加意精详，共襄重举”，经过多人多次审查校对后正式刊印，“誊录须楷书，正字不可从俗减写，亦不可误以同音之字，致上代小字与下代大字不对”；“校阅当念谱牒之重，一名一字，不可稍涉鲁鱼，每编成一卷，即以原册对所编之稿，每誊清一卷，即以编册对所誊之真，每印出一页，又即以清册对所印之章，始终细密毋怠”；“督刊须勤赴坊察验，期于铅字端正，纸墨精良，印刷时会同提调、监修、收掌照应印切数，印完随即退版，倘查点不周，致有滥行私印，及各卷中有复页少章之弊，皆督刊之咎也”^④。笔者曾有疑问，究竟是孔传埭撰写之误还是校阅之怠，抑或督刊之咎？孔子博物馆现存有该谱抄本一套，应为刊印之前供核对的誊抄清册。对比清册与铅印本，或可以查明真相。遗憾的是该清册恰好缺少载有序文的卷首之一，已无从查验。不过“弘治”“天启”字形完全不同，想来不会刊印错误，而且按照职责孔传埭也须亲自查看铅印本，即便有误，本人应容易发现。如此推测，应当是孔传埭序文原文就是“弘治”二字。至于是其本意如此还是疏忽所致，那就不得而知了。孔传埭作序的1937年正值侵华战争蔓延扩大之时，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受时局不靖影响，加之家谱编修事务庞杂，大谱仓促完成，疏忽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孔传埭是民国合修大谱重要的倡议者和全程参与者，其自叙“是役历十年之久，余始终佐

① 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孔传埭序》，第17—18页。

② 关于此处错误，有学者也曾指出，参见覃力维：《孔子“圣裔”的历史演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237页。

③ 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孔德成序》，第11页。

④ 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修谱事宜·宗府布告》，第36—37页。

其事”^①。身为孔氏族长的他亲历修谱发起、筹备、编修、刊印全过程，对修谱之事知之甚详，且为主要修谱者中辈分最大的两人之一，劳苦功高，声望卓著，他的序文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期，孔氏家谱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受到冷落，曲阜孔氏“弘治谱”的说法尚未传播开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学术研究重点和舆论关注兴趣的转向，家谱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尤其是孔氏家谱越来越受到注意。鉴于孔传堉的地位和影响，人们对“弘治谱”的说法深信不疑，未作深究，不经意间在著作和论文乃至更大范围的口耳相传中反复言说，导致这一说法广泛流传，甚至不断强化、有所发挥。在转相引述中，“弘治谱”的说法由原本弘治二年的时间要素，又增添入想象中孔弘绪、孔弘泰、孔弘幹等人物要素，错上加错，以讹传讹。孔弘绪、孔弘泰二人由于大宗嫡长衍圣公的身份原因尚可理解，孔弘幹则可能是其与衍圣公同一辈份且本身有修谱事迹的缘故而被加入其中，但这种臆测却又忽视了其生活时代与之不同的关键之处。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曲阜孔氏“弘治谱”的说法几成定论，甚至写入由官方编写的地方志书和孔氏新修的家谱中，成为主流说法。^②

结 语

唐宋以降，官方修谱日渐衰落，民间私家修谱逐渐兴起，至明清达到高峰。曲阜孔氏的修谱活动与中国家谱的发展历史基本保持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范意义。孔氏家族公认孔氏家谱创修自北宋元丰八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其后孔氏虽分南北，历经战乱等祸患，修谱活动却不曾中断。明清以来，曲阜孔氏修谱规模越来越庞大，修谱体例越来越规范完善，共经历明天启二年、清顺治十年、康熙二十三年、乾隆十年、民国26年、2009年6次修谱，除最后一次由宗子孔德成授意，其他5次均由宗子衍圣公亲自主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家谱的权威性毋庸置疑。然而，由于民国时期孔氏族长孔传堉序文之误，凭空多出一部所谓“弘治谱”。“弘治谱”的说法将明清以来由衍圣公主持的大修家谱活动起始的时间提前了133年。后人未能详加审明，造成其说大行其道，流传甚广，经过仔细考察，实则子虚乌有。本文综合各种文献正本清源，力证其伪，纠正这一错误说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孔子博物馆）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卷首《孔传堉序》，第19页。

^② 参见山东省曲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曲阜市志》，齐鲁书社，1993年，第127页；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178页；孔德壖主编：《孔子世家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1页。